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型俄汉词典编纂

魏春洁<sup>1</sup> 张金忠<sup>2</sup>

(1. 黑龙江大学应用外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2. 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 哈尔滨 150025)

**提 要:** 我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整整 30 个年头。在这个期间, 我国的俄汉词典编纂不论是实践层面, 还是理论层面, 均硕果累累。本文通过梳理大型俄汉词典编纂实践的历史脉络, 展示我国俄汉语词典编纂理论发展的轨迹。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大型俄汉词典; 编纂实践与理论

**中图分类号:** H356

**文献标识码:** A

1975 年 5 月, 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出版规划会议, 部署了 160 部汉语语文词典和汉外双语词典的编写、出版工作。1978 年国家拨乱反正, 各项事业重新步入正常轨道。这也为俄汉词典的编纂工作开创了崭新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词典工作走上发展的快车道。从 1978 年至今, 我国共出版八十多部俄汉语词典, 其中属于大型词典的有两部: 《大俄汉词典》(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室编写, 以下简称《大俄汉》) 和《俄汉详解大词典》(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 以下简称《详解》)。本文将循着两部大型词典编纂实践的进程, 追溯俄汉词典编纂理论发展的轨迹。

### 一、《大俄汉词典》

广州会议制定的规划将《大俄汉》的编写任务下达给黑龙江大学。该项任务主要由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室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部分同志和黑龙江省一些兄弟院校和单位也参加了词典的编写工作。最初决定对刘泽荣《俄汉大辞典》(下称《刘典》) 进行排版修订。然而, 在《刘典》的修订过程中, 一些指导思想与处理方法均已超出原编者的初衷, 而且改动的幅度也较大。后经有关部门协商, 决定将修订改为重编, 易名《大俄汉词典》。1982 年, 《大俄汉》编写任务顺利完成, 198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词典收词 15.7 万余条, 总计约 1000 万字, 是我国双语词典中的一部巨著。

《大俄汉》问世以后, 在各类刊物上相继出现一些文章, 对这部词典进行了全方面的评论。穆武祥认为这部词典与以往同类型词典相比有大、全、新等特点, 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 收入了大量的新词, 是当代俄汉词典收词最多的一部大词典; 2) 较多地增加了新词新义和新的用法; 3) 收入了常用的缩写词; 4) 专业词的译名准确; 5) 常用词, 特别是中国读者感到困难的词语均附有选自原著或原文词典的例证; 6) 为了避免因俄汉两种语言词义的差异而引起误解, 对一部分词汇做了必要的解释。(见穆武祥 1987: 66-71) 比如, 词条 бетонка 可以做这样的处理: [阴]混凝土路; (飞机场的) 混凝土跑道。该词作“混凝土跑道”理解时, 是特指“飞机场上的混凝土跑道”。为了避免读者与汉语中的其他类型的跑道混淆, 故用括号加上了必要的注释。词典中这类注释是很多的。正如谢尔巴在《俄法词典

再版前言》中所说：“如果我们找不到准确的译文，就给出几个大致相当的译文，同时尽可能辅以相应的解释。”（谢尔巴 1986：173）看来，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大俄汉》对虚词的处理方法也是很独特的。如在处理前置词方面，以往的俄汉词典大都根据意义的联系把要求不同格的前置词混合在一起编写，而《大俄汉》则改变了这一分类方法，完全以格的形式划分。副词等虚词词类在以前的俄汉词典编纂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李锡胤（1992：214）详细地论述了副词在词典中所处的地位及词典应如何处理这类词。《大俄汉》虚词条目的处理之所以独特、经得起推敲，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俄语语法专家的参与。他们对这类词条进行精心的编撰，使《大俄汉》在虚词词义划分体系上更加便于中国读者查阅。李蕴真指出了这种处理虚词词条方法的优点是：1）醒目、清楚，读者可直接查找某一格下面的词义。2）词义划分清楚，读者查询时，对词义可以加深理解，明了其使用范围以及用法。3）释义准确，说明清楚。4）有典型而丰富的例子作为例证。（李蕴真 1987：83-85）根据对有关《大俄汉》评论文章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俄汉》在诸多编纂参数上都大大超出了前面的词典，是我国俄汉词典编纂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然而，正如英国著名词典学家约翰逊所言，“词典就如同钟表一样，即便是非常优秀的也不能指望它完全准确无误。”一些研究者也指出了《大俄汉》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习语的编排及释义，个别法学术语的译名，此外，还有一些技术上的疏失。可喜的是，这部词典的修订版已于 2001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修订者大多是俄汉词典编纂的前辈，他们均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高的理论素养。修订版与原书相比，主要有以下不同：1）改正了原书中已发现的错误；2）增收了大约 2000 多个新词新义，如增加了 авторали（汽车拉力赛）、антистатик（抗静电剂）、гамбургер（汉堡包）、клонирование（克隆）等新词，增收了一些词的新义，如对 плыть 一词加上了一个新的分义“在失重状态下移动，太空行走”并配有相应的例证；3）释义、例证、译文有相当大的变动。释义更加准确、客观；例证更能体现词语在典型语境中的使用，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例证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不论是释义的译文还是例证的译文都更加准确、更合乎现代汉语规范；4）对个别体例、标注及附录做了变动。词典编纂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词典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

《大俄汉》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双语词典，尤其是俄汉双语词典的编纂理论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时期。根据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双语辞典学及国外辞典学论文索引（1949—1995）》的数据，这一时期，专门针对俄汉语词典的文章就有 30 余篇，还有一些有关双语词典的理论文章也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俄汉词典编纂的理论。此外，199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俄汉词典编纂学研究》，这是唯一一部专门探讨俄汉词典编纂理论的论文集，它标志着俄汉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新时期的到来，为编写更大规模的俄汉词典做了语言材料上的准备和理论上的铺垫。

## 二、《俄汉详解大词典》

《大俄汉》编纂完成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及中俄两国交往的日益频繁，已有的俄汉词典的广度和深度都需要进一步拓展。1985 年，黑龙江大学承担了编写《详解》的任务，这是赵洵等老一辈词典家的夙愿。该课题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这一项目也曾列入 1986—1987 年《中苏文化合作计划》和 1989—1990 年《中苏教育科学合作交流计划》。经过 10 年全国 50 多位资深学者和词典专家的辛勤劳动，词典的编纂工作于 1995 年年底完成，通过了成果鉴定，并于 1998 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详解》不是一般的双语词典，它是中国俄语研究史上最大的一部，是中国科学界的大事，是中国俄语学家的巨大成就。”（宋采夫《详解》序言）

《详解》具有六个方面的显著特点：1）收词量大而广。收入现代俄语通用词汇、专业词汇、缩略语及专有名词 24.6 万条，创国内俄汉工具书收词之最；2）兼采俄苏和英美辞书

编纂法之长，在语词为主的前提下适当增收了百科词目，这种熔语词和百科词汇于一炉的编法，既优化了收词结构，更方便了读者；3）采用多层次释义法，区分意义、意味和特用三个层次，这样做既避免了释义过分笼统，又避免了释义过分零碎，使俄语词义体系一目了然；4）采用多种释义手段，纵深揭示词义内涵；5）提供丰富的例证。双语词典系统地采用书证，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深入而准确地理解词义和用法，提高翻译技巧，在深度上有重大突破；6）书后列有 17 种附录，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很强的实用性。

针对这部集俄汉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于一身的辞书巨制，在词典出版的前后，一些学者纷纷撰写文章，对词典的编纂原则、收词范围、词条的结构、义项的划分、例证的选配等编纂参数进行了构思、谋划和科学的论证。《辞书研究》杂志在 2000 年第 1 期开设专栏刊登《详解》编纂的理论文章。共有六位学者发表了文章，他们都是这部词典的主要编者。陈楚祥（2000：15-24）以《详解》为例，对大型双语词典编纂的普遍理论进行了阐述；郑述谱（2000：11-14）对这部词典编纂的历史背景及与其他同类词典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色做了精辟的论述；李锡胤（2000：25-29）、王乃仁（2000：30-35）等对这部词典的词义结构以及一般双语详解词典所采用的释义方式进行论述；陈叔琪（2000：35-41）论证了这部词典的例证选配原则，突显了《详解》的配例特色。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该词典还有一定瑕疵，王加兴（2002：52-55）就曾指出该词典在词条释义和例证翻译中的个别疏失。

### 三、俄汉词典编纂理论发展的轨迹

从最初俄国传教士编写俄汉词典到《详解》的出版，我国的俄汉词典编纂实践成果辉煌，捷报频传。但是，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以前，俄汉词典编纂多半是为了满足俄语教学和翻译等实践活动的需要，俄汉词典界的理论意识比较淡薄。50 年代，随着一批俄汉词典的编写完成，国内随之开始了俄汉词典编写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最初，学者们发表的是一些有关俄汉词典评论的文章，俄汉词典编写的理论研究初见端倪。尤其是国内第一部大型俄汉词典——《刘典》问世以后，学者们对俄汉词典编写的认识逐步深入，发表文章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所涉及问题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宽，逐渐扩展到俄汉词典编纂理论研究的诸多方面。应该说，俄汉词典编纂理论的形成是与词典编纂界对一些重大实践问题的处理和妥善解决分不开的。这些问题大致包括：词典编写集体的组成问题、词典蓝本问题、对词典各个参数（包括词典的广度和深度）的加工问题等。

“词典编纂，尤其是大型词典的编纂，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编者的素质；二是掌握的资料。”（陈楚祥 2000：15）一般说来，词典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传统的俄汉词典编纂，除了要有上乘的俄语单语词典作为蓝本等先决条件外，还要求有一支高水平的编者队伍。图书质量的最主要的保证是作者的水平，这话是很有道理的。而作者的水平自然包括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意识。词典编纂理论正是随着编者实践经验的日积月累、理论意识的逐渐增强和学术水准的不断提高而形成和发展的。

对照《大俄汉》和《详解》的编者名单，我们会发现，《详解》的将近半数的编者也参加了《大俄汉》的编写。但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此时的编者已经非同彼时。首先，编写《大俄汉》对这些编者来说，是一次绝好的实践机会，在编写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进一步提高了编者的理论水平。再者，结合这部词典的编写，编者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深入地阐述了词典的各个参数，总结了词典编写的经验。《大俄汉》交稿以后，一些编写成员又先后完成翻译《苏联百科词典》、编写《俄汉新词新义词典》等多项任务，这使他们的业务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对语词词典的认识更加深入。回顾《大俄汉》的编写，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所限，编者对双语词典的深入理解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自然会有一种水平没能全部发挥出来的感觉。顺便提一点，当时多数成员已经年逾半百，他们很想更充分地发挥余热，留给后人一部更加科学、实用的词典，于是他们萌生了编写更

大的一部词典的愿望。经过几番波折，编写计划得到了批准。这便是后来的《详解》。编写之初，词典编者制定了详细的编写说明书，并且经过科学的论证，而后经过编委会讨论、补充，成为词典的《编纂细则》，它是词典编写的纲领性文件。这个《编纂细则》可能是第一个最详尽、最有理论性、也是最科学的指导俄汉词典编写的文件。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词典编纂理论的进步和编者集体实践经验的成熟。这在俄汉词典编写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创举，为《详解》的保质保量完成提供了可靠保证。

《详解》于1995年编写完成，1998年6月出版。词典在学术含量、编纂水平、出版质量等多方面均达到我国最高水平。

俄汉词典编纂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突出反映在词典对各个参数加工的广度和深度的变化上。词典的广度反映在它的左项，即收词、立目，而深度则表现在右项，即词条内所包含的信息量（包括语文的、百科的、超语言的）。（陈楚祥 2000：16）词典的广度和深度是相辅相成的，广度中有深度，深度中也有广度，两者密不可分，服从于同一个目标：保证科学性与实用性。

广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词典收词的多少。然而，收词量的大小也不只是广度问题，其中也包括深度问题。因为“语言的词汇是大致成体系的。词汇这个大集里面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子集，子集又有子集”。（李锡胤 1991：75）几部大型俄汉词典中，《详解》的收词量首屈一指。这部词典在《大俄汉》基础上扩大收词量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1）增收了专业词。专业词本来就是词汇体系中一个广泛的词层，而且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人们的科学知识明显增加，社会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不少专业词已经进入通用词群，一些专业词的词义发生了变化，因此，增收百科性词语（专业词、专名词）客观地反映了现代语文词典发展的方向。2）正文中收入专有名词，吸取了西方词典传统的优点，避免了俄语词典传统的缺陷。3）增收大量新出现的缩略词。增收缩略词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随着语言的变化，缩略词也在不断派生出新词。4）副词，尤其是谓语副词，独立立条是符合科学性原则的。原因之一是副词作为整个词汇构成中的一员，理应享有与其他派生词（如动名词、形容词构成的名词等）同样的地位；原因之二是副词作为一种语法范畴，其作用不比其他词类逊色。5）大量增收了近20年来俄语中出现的新词（包括外来词）。（陈楚祥 2000：18-19）

《详解》的广度同样反映在义项方面，词典义项收录全面，划分精细。这首先表现在词典多层次反映词义结构，多途径描写词义，即采用多层次释义方法，这种立体释义法使词条义项划分更精细，凸现了词的区分意义、意味和特用三个层次。（王加兴 2002：52-55）这是俄汉词典编纂理论的一个重大飞跃，也是词典深度加强的一个重要表征。采用这种方法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有很大的实用性。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在《大俄汉》及其他词典中查找不到的义项，在《详解》中几乎都能逐一查到。如在“Меловая скала над чёрным хлюпавшим потоком осталась позади.”一句中的“хлюпать”在《大俄汉》中查不到合适的义项，而《详解》中则有“（波浪，急流撞击……时）哗啦哗啦地响”这样一个意味，用来翻译此句中的“хлюпать”，简直是天衣无缝！义项全还表现在《详解》对一些词义的扩展、变化和更新反映得较为及时。像“взрыв”一词，除了原义“爆炸”之外，《详解》还列有该词的新义项：爆炸（激增，急剧增长），并提供了现今最常用的例证：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взрыв 人口爆炸，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взрыв 信息爆炸，信息激增。《详解》运用了多种释义手段：翻译（译解）、解释（详解），指出使用范围，提供同义词、反义词，使用各种标注，提供专名的拉丁文学名、给出一些词语的词源等，向纵深揭示词义内涵，这些都反映了词典深度的明显加强。

《详解》的广度和深度还充分反映在它所提供的大量的例证中。我们只要阅读一下 гриб 这个词条，对这一点就会深信不疑。在这个词条的第①义项“蘑菇”中，给出了大量例证：белый гриб 白蘑菇，чёрный древесный гриб 黑木耳，шляпочный гриб 带伞的蘑菇，свежие

грибы 鲜蘑, сушёные грибы 干蘑, съедобные грибы 可食的蘑菇, ядовитые грибы 有毒的蘑菇, шляпа гриба 蘑菇伞, ножка гриба 菌柄, суп с грибами 蘑菇汤, картошка с грибами 蘑菇炖土豆, собирать грибы 采蘑菇, сушить грибы 晒蘑菇, солить грибы 腌蘑菇, тушить грибы 炖蘑菇, пойти в лес за грибами 进林子采蘑菇, отравиться грибами 吃蘑菇中毒。此外, 词典还提供了两种“蘑菇状的东西”: деревянный гриб для штопанья чулок 木制蘑菇形补袜板, гриб атомного взрыва 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这种通过语言手段提供大量的超语言信息和百科知识的做法, 是非常值得大型语文词典借鉴的, 充分体现了词典的广度和深度。

可见,《详解》在提升科学性的同时, 也十分注重词典的实用性, 它所提供的这些系统材料对读者大有裨益。

## 结语

我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整整 30 个年头。这期间, 我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俄汉词典编纂不论是实践层面, 还是理论层面, 均硕果累累。词典编者对材料来源的认识不断加深, 运用蓝本的理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理论意识很研究能力逐渐增强。两部大型俄汉词典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充分展示了我国俄汉语词典编纂理论发展的轨迹。

## 参考文献

- [1]陈楚祥 2000 略论大型综合性双语词典理论建设中的几个问题——兼评《俄汉详解大词典》[J], 辞书研究, 第 1 期。
- [2]陈楚祥 2000 浅议现代词典学的发展及词典编者的素养[A], 双语词典论专集[C],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3]陈楚祥 2000 略论大型综合性双语词典理论建设中的几个问题——兼评《俄汉详解大词典》, 辞书研究[J], 第 1 期。
- [4]陈叔琪 2000 《俄汉详解大词典》的例证选配[J], 辞书研究, 第 1 期。
- [5]李锡胤 1992 为副词在词典中争“座位”[M], 俄汉词典编纂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6]李锡胤 1991 词典中的婚事“马赛克”,《李锡胤论文选》[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7]李锡胤 2000 多层次反映词义结构——谈《俄汉详解大词典》的释义特点[J], 辞书研究, 第 1 期。
- [8]李蕴真 1987 《大俄汉词典》中虚词条目举隅[J], 辞书研究, 第 6 期。
- [9]穆武祥 1987 《大俄汉词典的大、全、新》[J], 辞书研究, 第 6 期。
- [10]王加兴 2002 试析《俄汉详解大词典》词条释义和例证翻译中的得与失[J], 中国俄语教学, 第 3 期。
- [11]王乃仁 2000 论双语详解词典的释义方式[J], 辞书研究, 第 1 期。
- [12]谢尔巴著, 陈楚祥译 1986 俄法词典再版前言[M], 词典学论文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3]郑述谱 2000 从《俄汉大词典》到《俄汉详解大词典》[J], 辞书研究, 第 1 期。

# **A Survey of the Compilation of Major Russian-Chinese Dictionari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I Chun-jie ZHANG Jin-zhong

(Application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Slav Language  
Colleg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undertaken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three decades.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the achievements in compiling Russian-Chinese dictionaries are remarkable, both pract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practice of compiling major Russian-Chinese dictionaries, this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outlin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ts theory.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jor Russian-Chinese dictionary; practice and theory of compiling dictionaries

**收稿日期:** 2010-03-05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项目（项目编号 08D021）、哈尔滨师范大学预科研项目及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俄语联想语法与联想词库建构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11542060）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魏春洁（197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应用外语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俄语语言学、俄语测试学；张金忠（1968-），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俄语词典学、修辞学。

**[责任编辑: 张春新]**